

绪 论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到阶级的产生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从父系社会开始，男性就以其先天生理上的优势而逐渐获得了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女性的绝对统治权，女性就逐渐处于被奴役、被贱视的地位。所以两性间的不平等实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共有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即男权社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过尽管这种不平等是“历史的必然”，但也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永久的现象。随着人类的进步，逐渐摒弃其不合理性而走向男女平等，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较为漫长和艰辛。今天的世界范围内都有对男女平等的呼唤，并且在相当多的先进国家收到了实效，就足

以证明这一点。

在中国，男女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具有的绝对的奴役权、统治权，在文明的早期就被《周易》哲学化地论证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易·系辞传上》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意思是说，天高而尊，地低而卑，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由低到高排列，贵和贱的等次就定位了。它讲的既是自然现象，也是乾坤二卦的排列顺序，更是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因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周易·说卦传》第十一章），所以“天尊地卑”，就是乾尊坤卑，就是男尊女卑，就是夫尊妻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正如有的学者说：“《系辞传》开首的这几句话准确地将《周易》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揭示了出来，尤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两句话把握住了《周易》的要害和关键。”^①确实如此。《系辞》这段话不但说男尊女卑等观念是取法于天道的，而且说它是亘古如此、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因而也就成了必须服从的绝对律令了。

而作为这一绝对律令在封建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三从四德”，就是“七出”，就是一夫多妻，就是“夫为妻天”，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至在爱情婚姻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这些荒谬绝伦的道德学说和规范。这些规范，曾戕杀了无数的中国女性，也戕害了无数的中国男性，表现出了极强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特性。也就是说，虽然男权社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它发生的初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就会逐渐失去其合理性，甚至走向荒谬。因此，它也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5 页。

但是，意识领域的东西具有极其顽强的惰性，一个传承了几千年、被统治者不断强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要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今天男女平等已被公开倡导，某些荒谬的道德观念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旧的道德观念是很难除去得那么彻底的，就是我们自己，也大都程度不同地沉溺在某些旧观念中而不自知。本书就试图运用女性主义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历史题材剧的某些现象和个案的分析批评，促使我们从沉重的历史积习中超脱出来，清醒地认识到男权文化的消极性、落后性甚至荒谬性，认识到女性自强自主自立的重要性，为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达到两性间的真正的平等，做一点儿工作。

本书所谓的女性主义，简言之，就是一种从男女平等角度分析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

这种主义或说方法认为，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应该与男性平等；女性的才能智慧胆略见识等诸方面都不逊色于男性，女性应该自立自强自重；在承认女性与男性基于生理不同而形成的某些特性的基础上，认为情感与事业对于男性女性是同等重要的等等。其详细内涵，在本书的文章中都结合具体剧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本书所说的历史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剧中所描述的最基本的事件是有史可征的戏剧包括在内，而且“剧中情节，主要关目或其具体背景或人物精神有相关的文献依据即可。可据正史，可据野史，也可据文艺创作的实际等”。^①从时限上说，本书将描写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历史人物剧均放在研究视野之内。

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页。详细阐述，可见该书相应部分。

本书共分八章，前四章研究的对象是古代历史剧，后三章研究的对象是当代影视历史剧；最后一章是具有综合性质的散论。目录按照所涉及的剧中人物的历史时代顺序排列。所有文章都是通过认真思考，反复推敲之后撰写出来的。我们衷心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唤起学术界和影视界对历史剧中女性问题的关注。

第一章 古代历史剧中的 女性与政治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几部古代历史剧的分析，考察了古代戏剧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态度。认为元杂剧《钟离春智勇定齐》对钟离春辅佐齐王成就功业予以歌颂，明传奇《节侠记》对武则天做皇帝极尽丑化，很能表现中国古代男权文化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态度：赞美女性在男权文化前提下施展安邦治国才能，但不能忍受甚至反对女性在政治上凌驾男子之上位居统治地位。以女性成功施行“美人计”为题材的剧作，《连环计》利用的是貂蝉对吕布的感情，貂蝉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政治工具；《浣纱记》中的西施虽然被罩上一层“爱国”的面纱，但实际上她也不过是成就范蠡政治功名的工具；《连环记》中的貂蝉则被赋予了好男人才有的美好品质和为国为民的高尚动机，从被动的政治工具变成了主动的政治工具，

或者说从“工具”变成了“工具的制造者”，表现了对女性人格的一定程度的尊重，也许应该算是作者女性观上的进步。

在中国古代戏剧中，被提到的与政治有瓜葛的女性主要有三个类型，一是居统治地位、主持国家大事、对他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女子。这样的人极少，最典型的代表是汉高祖刘邦的吕后，唐高宗的武则天。二是因为与帝王或者政治权力中心人物有某种联系而被卷进了政治漩涡的女性，如春秋时期的西施，汉朝的王昭君，汉末的貂蝉，唐朝的杨贵妃等。三是平民女子，由于某种原因进入了统治阶层或者虽未进入统治阶层但却参与了与政治有关的活动，这种现象也很少，春秋时期的钟离春、北朝的花木兰要算是代表。当然，其中某些人的历史真实性究竟有多大还不太好说，因为我们这里取的是广义的历史题材剧，所以也将其划为论述范围之内。

提到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剧中的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知名度最高的就是王昭君的“和亲”，以及西施、貂蝉的“美人计”了。不过王昭君与其他知名度高的女性还不太一样，王昭君始终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作为与王朝政治相关的女性，她以自己的和亲换来了天下太平，尤其令人敬之、重之。当然，这是从《汉书》所记和亲的客观效果以及后来文学作品的演绎而言的。^① 如果依

① 《汉书·元帝纪》云：“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挛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挛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墙为阏氏。’”《汉书·匈奴传》云：“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引文中的“王墙”、“王墙”均为王昭君。

照《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之说，王昭君主动请行并非出于为国为民的崇高动机，而是源于“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①的个人怨望。不过即使如此，王昭君也是令人同情的。更何况魏晋时期的小说《西京杂记》中有元帝按图召幸、画工从中作弊，导致昭君远嫁匈奴的记载，使王昭君成了贿赂公行的腐败政治的受害者呢^②，昭君的命运就更令人感叹了。因此在魏晋至唐宋，王昭君的事迹就一直是文人乐道的话题。在戏剧中，由于马致远的《汉宫秋》以自己的感情对已有材料又进行了取舍虚构，使王昭君的形象更为高大、更令人肃然起敬了。但是西施和貂蝉似乎就没有王昭君那么“幸运”，她们也以美貌著称，但是她们政治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美人计”的“阴谋”行为完成的。她们以自己的色相成功地使信爱她们的人身死命丧，甚至国灭家亡。因此，对她们的评价历来不一。历史传说中她们的下场，也有幸和不幸两种。幸者如西施与范蠡相偕泛舟五湖，貂蝉与吕布成百年之好等；不幸如西施有吴灭后被沉入江中的传说，貂蝉有被关羽杀掉的传说等。本文拟

范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人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晋·葛洪《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从女性视角，以演绎西施与貂蝉的代表剧作为例，对此进行评述。

另外，主要不是以色相，而是凭借自己能力进入政治的，古代戏剧中有钟离春、花木兰等，此外，武则天也应该算在内。中国古代戏剧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态度是很可玩味的。大体说来，是赞美女性在男权文化前提下施展安邦治国才能，但不能忍受甚至反对女性在政治上凌驾男子之上位居统治地位。即女性只能作为男性政治事业的辅助，但不能成为政治中的主角。本文将从其中选择两个剧，对此进行分析。

一、《钟离春智勇定齐》赞美女性在男权文化前提下施展安邦治国才能

在谈到赞美女性在男权文化前提下施展安邦治国才能这类剧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元代郑光祖写的杂剧《钟离春智勇定齐》^①。这部剧取材于《列女传》和《战国策》，是一篇歌颂才智双全丑女的作品。戏剧中的钟离春是一个农村少女，她“先祖仕宦”，“父亲专务为农”。她“年长二十，心性明慧，胸襟磊落”，“生来懒攻针指，好习诗书”^②，在“农忙养蚕时序”，也要“偷偷闲学剑攻书”^③。“十八般武艺皆通，九经三史尽晓”，“文武兼备，韬略精深，有安江山社稷之才，齐家治国之策”。她心里想的是“上古先王治理天下，流传到今，非同容易”^④，她的志向是“治家邦播扬名誉”。^⑤齐公子追赶猎物与之相遇，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 第二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97 页。

同上书，第一折，第 499 页。

同上书，第 502 页。

同上书，第一折，第 499 页。

同上书，第二折，第 502 页。

她指责齐公子“不知禾苗在地，也不念麦将熟”，“不合骤骅骝践田亩”^①；她赋诗回答晏子说：“将军忙来将军忙，朝朝每日斗争强。空有江山并社稷，无人敢与定封疆”；批评齐国“哪个肯入水擒蛟，伏林刺虎，一个个智浅才疏腹内虚，怎能够志纵横德不孤，……岂不知西患衡秦，岂不知南讎大楚”。^②晏子发现她是个人才，认为齐公子“若得此女为夫人”辅佐治国的话，齐国就会“大治”。面对晏子的提亲，钟离春提出的要求是“既然如此，愿公子退谄佞，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用贤良，进直言，如此者愿备后宫”。^③后来她以自己的才华智慧解决了秦国提出的解开玉环、燕国提出的弹响蒲琴的难题，又布阵行兵，大败秦、燕、魏，使齐国居为上国。最后因为她功绩卓著，父亲被加官赐赏，褒封三代。

传统社会将女性的价值定位在婚姻上。三从四德，以夫为天，做贤妻良母，是女性的最终归宿；女性要想荣贵和青史留名，也只能靠丈夫的荣升而受封诰命夫人。至于安邦定国，出将入相，那是男人的事。《智勇定齐》与传统的女性只能主持内务的观念不同，认为女子不但可以有超出男子的才能（在本剧中作者让历史上有名的兵法家吴起也败于钟离春手下），而且可以像男子一样带兵打仗，一样建功立业，一样光宗耀祖；表现了作者女性观、婚姻观上的进步倾向和不同流俗。

但是，古代历史剧中像这样歌颂女子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事业上的戏剧毕竟是极个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类剧中的女性的行为要有一个前提：恪守封建男权文化法规。其表现是，第一，思想“纯正”，懂得君臣父子之礼。如第一折中钟离春在抒发忧国忧民的胸襟时唱道：“为人要心存义理，秉受纲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二折，第502页。

③ 同上书，第二折，第503页。

常”，^①第二，严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程序，懂礼教，不苟合。如第二折晏子、齐公子与钟离春桑田相遇，晏婴替齐公子向钟离春求婚时，钟离春回答说：“哦，晏丞相，久闻尊名。妾来采桑，非是结亲之所。有父母在堂，焉敢轻许。”^②后来齐公子与钟离春以玉带为信物，晏子劝钟离春“车载着同回，异日与你父母行礼，择吉日良辰，成亲如何？”钟离春说：“此非礼也。既要结亲，迎礼于钟氏之门，择吉日良时，亲迎过门，此其礼也，若是同（车）载回，是为奔女也。”再三强调要“纲常礼乐定规模，把人伦身体拘束”。^③第三，女子纵有超世绝伦的文韬武略，也只能以对男性辅佐的面貌出现和以附属于男权社会的形式而告终——钟离春只能以齐公子之正夫人身份施展才能，胜利之后她也永远只能是君夫人，而绝对不可以像武则天那样成为一国之主，凌驾在男权之上。

就本剧讲，钟离春具有很强的男性化倾向，未遇之前，她像元杂剧中所有怀才不遇的男性主人公一样，叹息说：“无盐，几时是你那发迹的时节也！”^④即“发迹”、建立功业是她人生价值所在。她丝毫没有女性天性中的爱美之心，对个人婚姻，也没有人性中必备的感情因素的追求，纯粹出于政治上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当然这可能与元杂剧体制短小，不太容易旁生枝节充分展开情节有关。不过就女性观念讲，本剧的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①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00 页。

② 同上书，第 503 页。

③ 同上书，第 504 页。

④ 同上书，第 501、502 页。

二、《节侠记》 男权文化对女性执政的不能容忍

但一般说来，古代历史题材剧对女性参与政治的赞许也就仅此而已，如果女子不甘“雌伏”，要想切切实实地执政，甚至觊觎皇帝宝座，那可就不行了。这从对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当权女性吕后和武则天的态度就可一目了然。凭心而论，吕后和武则天的政治才能都是值得称道的。在《史记·吕太后列传》中太史公云：“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对吕后当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措施和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给予了充分肯定。武则天没有才能，仅靠权术阴谋和嗜杀，也不可能从唐太宗的才人一步步当上了唐高宗的皇后，乃至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大周朝。但是中国古代戏剧中的吕后和武则天多是反面形象，多写她们的嫉妒、残忍、荒淫和嗜杀，很少提及她们的政治才能。虽然许多作品已经佚失，但从现存剧的题目上就很能看出内容和作者的倾向：如元杂剧有《吕太后人彘戚夫人》^①（马致远），《吕太后探韩信》^②（王仲文），《吕太后使计斩韩信》^③（李寿卿），《吕太后醢彭越》^④（石君宝），《吕太后饿刘友》^⑤（于伯渊），《武则天肉醉王皇后》^⑥（关汉卿）等。

戏剧对吕后、武则天一再贬斥的原因，现存的明传奇《节

① 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9 页。

② 同上书，第 236 页。

③ 同上书，第 256 页。

④ 同上书，第 260 页。

⑤ 同上书，第 272 页。

⑥ 同上书，第 147 页。

侠记》给予了很好的解释。^① 这部描写武则天时期政治斗争的历史剧，对武则天“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之举深恶痛绝，剧作以拥唐还是拥武作为划分忠、奸的分水岭，拥武的一概是反面人物。作者借正面人物裴炎之口唱道：“龙赓居尊国运艰，这牝鸡鼓翼司晨，那雄狐肆志滔天……”^② 另一下面人物裴佑先说：“我非是一家阿党，也只为万古纲常。由来妇道无相抗，怎临朝擅夺乾纲……”^③ 可见反对武则天当政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她当权是“牝鸡司晨”，败坏风俗！剧作对武则天极力丑化，极写武则天荒淫无耻、秽乱宫廷的丑恶，如第四出《忠忤》，写在举行改唐为周的典礼上，武则天和张昌宗一起出来接见百官，武则天口中还唱着“梦里欢娱，漏传五鼓”的曲子，仍然沉浸在昨夜的欢情之中。她草草处置了一些政事后，就又急切地拉着张昌宗说：“我与你且入宫去罢。”竟然使“堂堂朝端”成了“淫宣奸炽”、“狐聚鬼蜮”的场所！^④ 剧作写武则天残害忠良，滥杀无辜，重用“意在逢君，专工谗候”的卑鄙齷齪的宵小之徒等等，总之，武则天几无是处。这显然是剧作者以男权偏见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和剪裁的结果。如果给武则天换个性别，人们肯定会说他（她）：“性恬淡，不喜（女）色，后宫嫔妃仅数名。”

总之，在男权文化看来，政治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无权问津。拥有成千上万佳丽是身处至高无上地位的男性皇帝无可争议的特权；女人拥有再大的权力，也应该严守贞操，“从一而

① 作者许三阶，一说作者不详。现存两本：一是《六十种曲》本，另一是崇祯时刊本，署名“梅花墅改订”，《古本戏曲丛刊》据以影印。

② 毛晋编：《六十种曲》第十二册《节侠记》，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 页。

③ 同上书，第 13 页。

④ 梅花墅改订、玉茗堂批评本对本段描写批论说：“淫宣奸炽，堂堂朝端，竟如狐聚鬼蜮，千载而下，描写如睹。”

终”，否则就是淫邪。男性皇帝为保全自己政治地位父子兄弟互相残杀不足为怪，女性如此则就是十恶不赦。汉武帝兴巫蛊之案杀死太子，赐死年轻无辜的钩弋夫人，人们照样歌颂他雄才大略；唐太宗诛除建成元吉丝毫不损于他的英明伟大。从古至今的戏剧中没有几个人抨击唐明皇的霸占儿媳，相反倒或是将安史之乱的责任推到杨贵妃身上，如明代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或是对李杨的爱情多所同情，如清初洪昇的《长生殿》；明武宗的“游龙戏凤”被戏剧不断津津有味地演绎！所以说，尽管武则天本人确实有许多值得非议的地方，但是她之所以落得个千秋骂名的下场，归根结蒂是男权文化对女性执政的不能容忍。

三、《浣纱记》 女性是成就男性政治功名的工具

《浣纱记》是明朝梁辰鱼撰写的传奇，是中国古代众多西施剧中最受推崇的作品。与其他一些西施剧相比，《浣纱记》在思想境界上表现出了不少超人之处，如它歌颂范蠡和西施的爱国和自我牺牲精神，让西施完成破吴任务后又与范蠡泛舟江湖共度人生等等。不过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内容时，总是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实际上剧中的西施，只不过是范蠡成就政治功名的工具而已。

西施是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兴亡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她正式进入吴越纷争的历史则是在东汉《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史实与传说兼而有之的作品中。^①关于她的下场，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吴灭之后，她被沉入江中，如李白的《西施》诗

当然，历史上是否实有西施其人还不好说，对此多有记述。因为本书讨论的是广义历史剧，所以，关于西施的剧也在论述范围之内。

说：“西施越溪女，出自苕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还有宋金时期董颖撰写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也是这个结果。^①另一是吴亡之后，范蠡携之泛舟五湖，远遁他乡了。戏剧也大体上遵循这两种说法。宋元戏文有《范蠡沉西施》^②（阙名）；元杂剧有《姑苏台范蠡进西施》^③（关汉卿），《灭吴王范蠡归湖》^④（赵明道），《陶朱公五湖沉西施》^⑤（吴昌龄）等；明杂剧有《陶朱公五湖泛舟》^⑥（汪道昆）；明传奇《浣纱记》（梁辰鱼）；明清传奇《倒浣纱》^⑦（阙名）；清杂剧《浮西施》^⑧（徐石麟）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梁辰鱼的《浣纱记》。

在那些让西施沉入江底的剧作中，人们不难看出男权文化的荒谬无理和丧失人性。西施是一个民间弱女子，只因为她长得美丽，便被越国的统治者主动送到吴国，以使吴王沉溺酒色，不思进取，为越国伐吴作准备。出这个“奇妙”计策的男人们，丝毫没有、也不屑于考虑西施的个人意愿，更没有认为这个计策对于西施来讲实属伤天害理。对吴国，西施是想去也得去，

如《道宫薄媚·西子词》大曲的“第六歇拍”云：“哀诚屡吐，甬东分赐，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宝钿红委，鸾存凤去，辜负恩怜，情不似虞姬。尚望论功，荣归故里。降令曰：吴无赦汝，越与吴何异。吴正怨，越方疑，从公论合去妖类。蛾眉宛转，竟殒蛟绡，香骨委尘泥。渺渺姑苏，荒芜鹿戏。”

②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 页。

③ 同上书，第 148 页。

④ 同上书，第 289 页。

⑤ 同上书，第 230 页。

⑥ 同上书，第 432 页。

⑦ 同上书，第 1626 页。

⑧ 同上书，第 683 页。

不想去也得去；对吴王夫差，西施是不爱也得装出爱的样子，爱也得最终把夫差送上死亡之路。对越国，西施完成了任务、灭掉了吴国，她得死，因为她妖媚惑主，是个祸水，犯有灭掉吴国的巨大罪恶；她完不成任务，她的家人也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她背叛了越国。董颖撰写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说：“吴正怨，越方疑，从公论，合去妖类”，好一个“公论”！这就是男权文化的逻辑！

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那么灭绝人性，一些男性也感到这个事情做得太不人道，让这么个绝色女子就那么无辜地死了，也有点儿于心不忍，于是同时也有让西施与其情人范蠡泛舟五湖，享受人生的结局。梁辰鱼《浣纱记》以美丽的辞藻，演绎了这个美丽的故事，于是好心的男人和绝大多数女人终于感到了某些安慰，因此对这类剧所表现的思想也就赞不绝口。如：“《浣纱记》首先是一出极为崇高而苦涩的爱情悲剧。一缕洁白的轻纱，珍藏在情人的胸怀，也维系着国运的兴衰。范蠡、西施藉此分而后合，越国、吴国由之存亡迁移。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家范蠡与天姿国色的女娇娃西施在明澈的溪水旁遇合定情，却又不得不在沉重的政治风云中怅然分手。在国家利益与儿女恋情之间，范蠡与西施牺牲了后者，共同作出了无限悲凉、屈辱、痛苦而豪壮的决定。这对情侣在定情之后，因为范蠡在吴国为奴而苦等了三年，之后又因西施在吴王身边被蹂躏而煎熬了三年。六年的相思换来了越国的胜利，但对花已残、心更苦的当事人双方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场灵与肉的大劫难。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乃至极为崇高的政治品位，都是以爱情悲剧作为前提而铺展开来的。”^①“梁辰鱼《浣纱记》把范蠡、西施的爱情与吴越兴亡结合起来，歌颂了范蠡和西施为国家利益牺牲

个人爱情的精神。范蠡和西施以一缕浣纱定情，但当国家灭亡之后，为了灭吴复国，范蠡决定让西施去吴国迷惑吴王。他说：‘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自亦可保，后有会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自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婚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作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西施也说：‘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可见他们对于国家存亡与个人爱情幸福的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并能够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爱情幸福。”“范蠡和西施有着热爱祖国的共同理想，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的贞节观念，牺牲个人爱情挽救祖国，又不受愚忠思想的束缚而功成身退，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处理爱情与国家、个人与君主的关系，是过去所罕见的。”^①

应当说，这些评论都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再仔细咀嚼，就会发现，说到底，西施还是工具——不仅是越王勾践的工具，更是范蠡成就自己功名事业的工具。因为范蠡辅越伐吴作出重大牺牲之原因，不是为越尽忠君爱国的义务，不是扶弱诛强的正义感的驱使，更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仅仅是为了其个体人生功名的建立！为何如此说？请看下面的引文：

A. 《浣纱记》第二出“游春”开始范蠡初次登场的自我介绍：

[遶池游] 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为兵戈几年鞍马。回首功名，一场虚话。笑孤身空掩岁华。

（白）少小豪雄侠气闻，飘零仗剑学从军。何年事了拂衣去，归卧荆南梦泽云。下官姓范，名蠡，字少伯，楚宛之三户人也。倜傥负俗，佯狂玩世。幼慕阴符

许金榜：《中国戏曲文学史》，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8 页。

之术，长习权谋之书。先计后战，善以奇而用兵；包势兼形，能以正而守国。争奈数奇不偶，年长无成，因此忘情故乡，游宦别国。蒙越王拔于众人之中，厕之大夫之上，志同道合，言听计从，迩年以来，邦家多故，庙乏善策，外有强邻，正君子惕励之时，人臣干蛊之日

.....

.....偶尔闲步，试看世情，奔走侯门，驱驰尘境。我仔细想将起来，贫贱虽同草芥，富贵终是浮云。受祸者未必非福，得福者未必非祸。与时消息，随世变迁，都是一场春梦也。（唱）更衣变服，究古论今，较胜争强，不知何年才罢。笑你驱驰荣贵，还是他们是他；笑我奔波尘土，终是咱们是咱。追思今古，都付渔樵话。^①

B. 第四十五出“泛湖”，破吴之后，范蠡携西施远逝时说：

自家范蠡，辅我弱越，破彼强吴，名遂功成，国安民乐。平生志愿，于此毕矣。正当见机祸福之先，脱履尘埃之外。若少留滞，焉知今日之范蠡，不为昔日之伍胥也.....

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功名到手未嫌迟.....^②

以上文字说明：

1. 范蠡是楚国人而游宦到越的，对越国并不存在国家感情

① 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一册《浣纱记》，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3 页。

② 同上书，第 157、161 页。